

評 Stephen Banks, *Informal Justice in England and Wales, 1760-1914: The Courts of Popular Opinion*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4. 230 pp.

韓 蕾*

本克(Stephen Banks)為英國法律史研究者，此書提出法律史研究的新取徑，也就是以一般人民對法律的信念、乃至於想像，探討法律在社會中的實際作用。作者透過討論十八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世紀初，英格蘭與威爾斯鄉間對犯罪或違反當地習俗者的公開羞辱及懲罰活動，呈現英國民眾法律觀念、道德主張、社會角色認知等的變遷。作者認為成文的法律往往與人們對於法律內容為何，甚至法律應當為何的想法不同，正如蘇聯憲法明載普選與秘密投票等規章，史達林(Joseph Staling, 1878-1953)的統治卻可與之大相逕庭而仍宣稱合法，亦即成文法和實際的統治與執法未必一致。然而，此書著重於民間的法律觀點而非統治者的弄權行為，且其探討對象較接近社會史及文化史的範疇，也就是以英國鄉鎮的風俗變遷，企圖說明法律以及「人民對法律的想法」之間的互動關係，並由此反映英國十八到二十世紀的社會發展方向。書中提供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與材料，如在選舉權與公民教育普及下，英國大眾對權力的意識與政府觀念如何變遷、傳統貴族教化與管理地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方的狀況及其衰微，乃至於工業革命造成的物質條件變化對「社群意識」之影響等，皆堪學者再深論細究。

此書提出的研究取向並非否認成文法研究的價值，而是試圖呈現許多人的行為依據，實非源於法律的知識(legal knowledge)，而是來自法律的想法(legal thinking)。簡言之，作者認為社會的深層規則是基於世界觀，而非法律內文或判例。人們對法律的想像往往足以左右人際關係，以及政治經濟的論述和活動。他強調在法律史領域，多數學者較重視法律條文、法治機構的演變，與立法或法學要人的學說生平，而較少關注一般人民的法律觀念，「人民對法律的認知與信念」乃被視為民俗學、人類學或社會學的範圍。即如對哈特(H. L. A. Hart, 1907-1992)承認規則(The Rule of Recognition)的有效性之研究，¹略為接近本書的問題意識，但其所重在於鑑別某一規則是否屬於特定法律體系，²雖然確實涉及人們對法律的認知問題，然此仍屬於「對法律的知識」之討論，與作者所欲探究的民眾法律信念與既有法律體系的關聯性問題相去甚遠。總而言之，在法律史研究中，實際的成文法遠比「被相信」的律法更受學者注意。然在本書討論的事例中，即使鄉村群體的行為遭當局視為違法，參與者仍常堅執其對「法律為何」的信念，儘管此信念可能僅來自片面的法律經驗(如口耳相傳的封建契約)，或「人人皆如此」的社會標準。故本克主張在法治的落實中，「人們認為法律為何」或許比「法律條文為何」更為重要。

作者在書中以「嘈嚷樂音」(rough music)——源自群眾敲打鍋盆等器皿發出的吵鬧聲——所代表的鄉間遊行羞辱活動為主要分析對象，³這

¹ Nicola Lacey, "H.L.A. Hart's Rule of Law: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Quaderni Fiorentini* 36 (2007): 1203-1204, 1220.

² 參見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0-109.

³ 這些活動常以來自鄉野語彙的特殊名詞稱呼，包括英格蘭西部的

些活動的參與者多宣稱其所為合法，甚且乃為法律的伸張。關於「嘈嚷樂音」的研究頗有先例，然藉此細緻分析民眾的法律信念與英國官方法律傳統之關聯性及其變遷者，在本書之前恐無前驅。即便是對作者撰寫此書多有啟發的著名英國史家湯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其於「嘈嚷樂音」的研究中，仍鮮少著墨於民間法律信念的演變。湯普森提出群眾「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的說法，⁴亦確曾論及群眾的道德觀念和其所宣稱的「法律依據」之間的關聯性問題，然湯普森的詮釋偏重政治史的角度，⁵與作者著重法律史的取向仍不相同。

在第一章〈法律、象徵與懲罰〉(Law, Symbolism and Punishment)中，作者說明司法與人民法律信念兩者從密切到疏離的過程，也就是在司法現代化歷程中，官方對民間「執法」行為觀點的轉變。直到十九世紀初，遊行羞辱活動仍伴有實際的刑罰(如鉗口刑具、浸水椅的使用)，與司法審判關係密切，此即傳統時代所謂「示眾」之行。然十九世紀以降，「嘈嚷樂音」在司法運作中漸失地位，這是英國地方貴族自治為中央集權、標準一致的現代政府所取代的徵兆，也是自由主義改革的結果。如監獄體系的建立、公共空間的改造(過去遊行活動多在教堂附近的公共空間舉行)、對矯正(correction)信念的認同(故不欲以羞辱懲罰罪犯)、以及對社會革

skimmington(一說原為製作起司的長柄勺，指稱將扮演受辱者的人或其肖像公開展示遊行的活動)、直至二十世紀仍見於英格蘭北部的 stang ridings(意指女人被反置於馬、驢背上遊行)、與威爾斯的 ceffyl prens(木馬，意為犯過者被縛於木架上遊行)等。

⁴ 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The New Reasoner* 1 (summer 1957): 120-121.

⁵ E. P. Thompson 關於「嘈嚷樂音」的著作包括："Rough Music": Le Charivari Anglai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zations* 17 (1972): 285-312;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6); *Customs in Comm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Rough Music Reconsidered," *Folklore* 103:1 (1992): 2-26.

命的抵制等，均為「嘈嚷樂音」不再受到官方支持的因素。而下層民眾基於傳統的道德觀、性別角色、以及階級次序等所產生的法律信念，與實際的法律體系有愈趨嚴重的隔閡與衝突，應是最關鍵的因素。

第二章〈地方主義、正義、與審判之權〉(Localism, Justice and the Right to Judge)探討人民所認為的正義觀念及如何實踐其所認知的正義，並呈現遊行羞辱活動往往與地方傳統節慶結合(如 Gangdays)的情況。這一方面表示此活動具有象徵意義，不只是針對個案所採取的作法；另一方面，作者強調過去的司法與民間懲處活動步調一致而相關，並引用弗柯(Barry Faulk)《公開處死》(Public Execution)中「英國死刑的歷史即是節慶文化的歷史」一語作為輔證。⁶事實上從許多司法用語與宣傳中，即可推測官方對於民間懲罰的贊助。是故，雖然現有文獻無法證實多少「嘈嚷樂音」活動先經調查及審判，但有限的實例已說明，若「嘈嚷樂音」先經調查、討論而後執行，其主導者皆對司法審判的程序有所了解，且其中懲治幾乎都符合某些既有的規範(無論是否為成文法)。換言之，參與者自認其行為來自有跡可尋的法律傳統。

第三章「嘈嚷樂音的類型」(The Forms of Rough Music)中，作者則是細緻討論「嘈嚷樂音」形式的差異，並解析背後的法律信念變遷。如將犯罪者從家中拖出，或使他人扮演之，到以肖像象徵犯罪者，便明顯展現民眾對於何為「合法」的意識轉變。而人民心中合法性的來源也隨時代有所不同。早期只要遊行由3個教區聯合舉辦，或延續3天，甚至先繞行於教堂周圍，參與者便自認該羞辱行為乃其合理的權力(right)，

⁶ Barry Faulk, *Public Execution; Urban Rhetoric and Victorian Crowds, Executions and the British Experience from the 17th to the 20th Century*, ed. William B. Thesig (Jefferson, N. Carolina: McFarland, 1990), 77. Cited by Stephen Banks, *Informal Justice in England and Wales, 1760-1914: The Courts of Popular Opinion*, 7.

然而十九世紀後期以下，這種奠基於宗教信仰的合法性，在民眾的法律信念中漸難維持。此外，昔日毆打或施刑的作法也漸趨消失，而演化為象徵性的攻擊，這也是法律觀念改變的結果。

在第四章「性、性別、與道德監察」(Sex, Gender and Moral Policing)中，作者以羞辱活動中對謬亂的兩性關係之懲罰，探討「合法、合於道德的兩性關係」的信念轉變，以及社群以此類罪名排外的行為。在發展方向上，對悍妻的懲罰漸趨沒落，取而代之的是對毆妻者的懲罰。他雖未斷言兩性關係有持續、一致的變化，但此現象確實顯露民間對於合法、合理的兩性關係之主張有趨於現代化的表現。此外，史料顯示被責罰者常非唯一的犯罪者，民眾的挑選依據應與該群體的價值取向關係密切。諸如外鄉人、非英國國教徒，或禁酒主義者(teetotallers)等被多數居民所懷疑的人，皆可能成為遭嚴格檢驗的對象。舉例而言，1891年在西庇納村(West Pennard)以外遇罪受辱的男子，其犯眾怒實因其滴酒不沾且非英國國教徒。此例中參與者皆既歡愉又憤怒，這反映出「嘈嚷樂音」所蘊含的慶典與懲罰雙重成分，以及人民須經由審判與處罰他人實踐其價值觀並獲得群體認同的情狀。

除卻排外動機，利益團體也藉此羞辱儀式與其他群體抗衡，並伸張他們所認為的正當行為標準。第五章〈捍衛經濟利益〉(Defending Economic Interests)即是說明公眾的懲罰遊行未必符合該地區大多數人的觀點，而經常為少數人服務。各團體皆自認其行為具有正當性，雖然其利益動機也不可否認。書中所舉 1876 年倫敦西部發生的懷特利百貨公司(Whiteley department store)遭群起圍攻的事件，便可呈現此種複雜性和衝突性。懷特利百貨公司高度展現企業精神與自由貿易的市場原則，此與傳統的公道價格、知足等觀念相違。經營傳統產業的商賈抗爭的原因，固然是源於他們在自由經濟成為主流後競爭失利，期望恢復其原有優勢，然而，他們對於不義的致富的反對，乃至對於古老的

公共福祉與社會義務等信念的堅執，也是他們抗爭的原因。此外，作者亦由此證明，群眾懲罰活動並非僅為庶民文化的產物，引發此舉並引導群眾者，也可能是社會中的中上階級人物。

然而，十九世紀以降，「嘈嚷樂音」常發展為對政治現狀的反抗，使得中上階層開始與之劃清界線。第六章〈政治反抗〉(Political Resistance)便是討論「嘈嚷樂音」如何被用於挑戰既有的社會次序。此情在南威爾斯最為顯著。威爾斯在拿破崙戰爭後由於人口過多、失業、農產品價格低落等困境，出現了反政府的活動，其著者為反抗不公稅收的蕾貝卡暴動(Rebecca Riots)。此外，1830年起於東肯特(Kent)，後蔓延於英格蘭南部與東部的史溫暴動(Swing Riots)，即為對抗教會什一稅(tithe)、濟貧法(Poor Law)、以及富農調降工資的事件。這些暴動的基本形式即為「嘈嚷樂音」，而政府當局對此不再以合作或寬容的態度待之。

專業警察體系於十九世紀興起的過程中，民間懲治的傳統並未消失。作者在第七章〈抗外社群〉(Resistive Communities)中展現群眾懲罰活動相對於現代司法體制的傳統性，同時說明積極進行此類活動者常為相對開放、激進的鄉鎮。這些地方有支持傳統工商業的知識份子、具備熟練技藝與自主性的工匠、促進團結的特殊自然條件、乃至宗教自由的思想，使人民得以維持生業而幾乎不受政府與貴族的控制。正因高度獨立，加上警察停留短暫或人數不夠，故即使專業警察體系逐漸成立，民間的審判、懲罰仍可作為地方自治的憑藉。可見群眾羞辱運動非僅表現鄉村保守思想，也與時俱進的反映人民的思想變遷。

十九世紀後半葉，傳統的羞辱儀式經常與勞工運動結合，然上層階級仍可利用某些公眾活動，使之符合政府所欲宣導的主張。亦即，政府對此除鎮壓外，也加以「馴化」，使之從屬於愛國的目的，如詆毀「國家愛國主義敵人」(national patriotic enemies)。此書第八章〈展演與逐斥〉(Performance and Proscription)既論述羞辱儀式如何被官方引導，也闡

釋其促進勞工文化形成之效。十九世紀末，人們為避免觸犯官方法律，逐漸不敢佔據小鎮中心舉行羞辱儀式，或把被認定的罪犯拖出並拳腳相向、遊行示眾，故羞辱儀式愈來愈流於象徵形式。然而，在某些工人群體中，仍保存獨立的(非官方)「執法」傳統並延續至二十世紀，且非固定舉行，使得定期的鎮壓行動無法真正的將其根除。在較為開放的工業鄉鎮及關係緊密的行會中，羞辱之舉仍為重要的凝聚力量，英國工人文化的要素——對名譽的重視——也由此形塑而成。直至 1930 年代，學生罷課、工人運動中仍可見羞辱活動的遺跡。

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嘈嚷樂音」趨於消失，作者認為鄉村群體意識的削弱乃其主因。第九章〈餘波〉(Aftermath)描述工業革命造成的社會變遷導致地方社群意識的衰微，而當少數群體仍試圖執行羞辱儀式，不僅在外人眼中為荒謬，在其內部也顯得捉襟見肘，難以為繼。隨著鐵路的出現、腳踏車的發明，以及由此引致的勞力流動，教區不再是司法單元與人們世界觀的依據，奠基於茲的「嘈嚷樂音」也漸趨式微。即使在某些地方猶有殘跡，其有效性也因為教育的普及、地方政府權力的提升、人口與觀念的流通等因素而降低許多。1979 年，一位畢業於牛津大學的牧師至郊區服務，其妻無意間冒犯當地人，鄉人便以「嘈嚷樂音」中傷害性較低的作法，如模仿、騷擾等動作來表達不滿，而對於在教育、文化上皆不屬於該群體的牧師夫婦而言，這些作法毋寧是滑稽怪異而非羞辱。也就是說，在現代法治之下，羞辱活動中的暴力手段已不再受到包容，而若無與社群共通的文化認知，與對該群體的依賴，則「嘈嚷樂音」實在無法產生重大的作用。

總而言之，人民對法律的信念儘管有所偏差，此仍具有真實的政治與社會力量。作者認為在十八、十九世紀，民間的懲罰與羞辱做法大多能有力的傳達集體的主張，而在二十世紀政府控制力提升以前，這也有效維護下層大眾的行為素質。雖然他並非期望「嘈嚷樂音」繼

續作為社會控制的力量，因其中亦有不少人藉機遂行私願。但透過這個研究，他對於純粹使用邏輯、理性、法條，而不借重人民心中的標準，是否能成功的維繫和治理一個社會，提出引人深思的質疑。

以下將就本書值得進一步討論與商榷的重要觀點加以評述。英國的共同法傳統與習俗的關聯性為何，是英國法律史研究的爭議重心之一，也是探討此書問題意識須涉及的重要觀念，作者對此問題提出整合前人研究的概念分析與評論，值得參考。他強調共同法傳統與民間信念常非一致，然而討論英國人民法律信念與官方法治的關聯，乃至執法者對民間羞辱活動的態度轉變，皆須考量英國的共同法傳統與民間習俗本有相互影響之實。如書中所及，十八、十九世紀時執法者雖欲反對部分傳統民間權力(包括有礙和平的羞辱活動)，然而共同法「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原則使其難以從理論上否定既有的傳統權力。作者指出史上研究共同法的學者約可分為兩派：一派宣稱共同法的基礎是前羅馬時代以降，傳續不斷的民間習俗，也就是相對於政權所建立的成文法，共同法是來自人民。著名的英國法學家布雷克斯頓(William Blackstone)便主張共同法為「習俗與箴言的總合」。⁷另一派則主張群眾的習慣不足以成為法律，共同法雖為不成文法，然貴族傳統與法官判例是其基準，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採納民間習俗。⁸作者基本上認同後者，並且在此書問題意識之下，他特為關注共同法法庭對習俗的塑造(而非習俗對共同法的影響)，舉例說明法庭調查習俗，乃至參照習俗的作為，對於民間習俗的鞏固和宣傳有所助益。

⁷ Sir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vol. 1, 17.

⁸ 參見 A. Cromartie, "The Idea of the Common Law as Custom," in *The Nature of Customary Law*, ed. A. Perreau-Saussine and J. B. Mur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57-258.

然而共同法若如作者所主張，其基準來自貴族傳統與法官判例，而對民間習俗有塑造的作用，則討論人民法律信念變遷的原因，應不能忽視地方貴族傳統文化本身的變化，及兩者之間的呼應關係。貴族統治與教化在民俗文化中的影響向為學者研究英國「嘈囂樂音」的重點之一。彼得柏克(Peter Burke)認為歐洲在十五到十八世紀經歷「大眾文化變革」(the reform of popular culture)，許多傳統慶典或儀式，乃至民眾的信念，皆受到教會或政權的反對乃至鎮壓，這反映上層菁英文化與民俗文化的對立日趨嚴重。⁹殷格蘭(Martin Ingram)則據此指出，探討民眾慶典與官方，乃至上層文化的關係變遷，可謂現代早期歐洲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取徑，並認為民間遊行羞辱活動實為菁英文化的延伸或滲透，而非由民間自行發展出的文化立場。亦即民間羞辱活動所蘊含的信念，反映了上層文化與民俗文化間具有密切的關聯與互動。¹⁰作者解釋人民法律信念之變遷，對於民間文化與上層文化間的互動不無警覺，但實際的討論則較少。事實上共同法法庭裁判因執法者即為貴族鄉紳，對人民法律信念的影響，與上層菁英對民間的教化、統治觀念應有重大關聯，而本書於此層面的討論稍嫌不足。¹¹

關於地方貴族自治過渡到中央集權的法治社會的狀況，作者則有

⁹ Peter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2009), 289-290.

¹⁰ 羅立參(David Rollison)訴諸殖民涵化(acculturation)的觀點，將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二分，殷格蘭批評此說，認為研究民間羞辱活動應兼顧菁英與大眾兩種文化觀點，方不至於誤解或偏失，同時也不能忽略各階級所共有的整體文化背景。參見 Martin Ingram, "Ridings, Rough Music and the 'Reform of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st & Present* 105 (1984): 79, 113; David Rollison, "Prope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Culture in a Gloucestershire Village, 1660-1740," *Past & Present* 93 (1981): 70-97.

¹¹ 參見 A. Cromartie, *Nature of Customary Law*, 118.

脈絡清晰的論述，呈現出以民眾信念入手，整合社會史與法律史研究的可能性。書中提及直到十九世紀初，英格蘭與威爾斯還有三分之二人口居住在鄉村，對人民來說，巡迴裁判法庭、季審法庭(quarter session)都只是遙遠的臨時事件。他們更熟悉的是地方領主的裁判。貴族面對地方事務常先訴諸居民的善意與自衛組織，而非法令規章或軍隊，故「嘈嚷樂音」在十九世紀以前確實常作為非正式法庭之下的懲罰機制。貴族的裁決就法律專業而言未必正確，然英國政府容許地方審判有限度的存在，其中最著名而流風至今的，為非專業的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裁判。在治安法官的記錄中極少有「嘈嚷樂音」，這表示此行通常被人民視為合法而不加以控告。但是到了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 1837-1901)中期，群眾羞辱活動已與正規的法律程序涇渭分明，這反映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貴族法庭為現代法治所取代的情形。與此同時，「嘈嚷樂音」也逐漸沒落。作者對上述現象的分析同時討論法律史(法律制度變遷、法治在民間的實際狀況)與社會史(地方貴族沒落，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興起)，而貫串其間的主題即為「嘈嚷樂音」所代表的民眾法律信念之變化興衰。

本書前驅湯普森已斷言，唯有地方社群能夠制定和執行部分法律，「嘈嚷樂音」才可能存在，傳統地方社會內部的自治難以於當今的政治體制下運行。¹²因此，本書第五章以下與前四章的性質差異便可解釋。十九世紀後期「嘈嚷樂音」沒落的過程中，羞辱活動漸與司法審判分離，轉為現代化之下失落者的反抗，或各種目的下非法的群眾運動。故前四章著重人民法律信念及其實踐的論述，後五章則探討民眾對於自身信念「不合法」或「不合時宜」的自覺提升之後，「嘈嚷樂音」的性質如何轉變。第五章〈捍衛經濟利益〉是鄉村人民面對資本主義化、市場自由化、工業化等社會變遷時，以「嘈嚷樂音」試

12 E. P. Thompson, "Rough Music Reconsidered," 20.

圖扭轉此種局面，欲鞏固其原有的傳統價值觀與既得利益。第六章〈政治反抗〉則呈現「嘈嚷樂音」與社會主義勞工運動合流，開始成為反抗教會、地主、富人、乃至傳統社會次序的力量，此與十九世紀以前民眾羞辱運動的保守性相去甚遠。第七章〈抗外社群〉則表現新舊思想交替的鄉鎮對「嘈嚷樂音」的運用，一方面保存傳統的地方自治精神，一方面卻也成為表達新思想的媒介。第八章〈展演與逐斥〉則是討論在「嘈嚷樂音」與官方司法分流以後，官方欲引導逐漸失控的民間羞辱運動，使之為國所用，然而民間羞辱活動仍與新興的勞工運動結合，勞工文化也因此留存傳統信念的遺緒。第九章〈餘波〉乃清楚呈現「嘈嚷樂音」的式微，即便是順應或反抗現代化的潮流，奠基於地方群體意識與傳統信念的「嘈嚷樂音」，終究無法存續於現代社會，遑論與現代法律體制並行。¹³是以本書第五章以降雖較脫離法律史的脈絡，卻是以「嘈嚷樂音」為核心的優秀社會史研究，呈現英國下層大眾面對「現代化」所受的衝擊與調適的過程，足堪學者詳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書在史料運用上相當可觀。作者使用大量極少被閱讀的檔案文獻，分藏近 20 處不同的檔案館和民俗協會，並求助於許多地方史學家。此外，他也參考了十八到二十世紀數量龐大的報紙及期刊，對前人研究的整理也堪稱完備，故無論本書在觀念的討論、史實的解釋上是否有其缺失，作者在英國「嘈嚷樂音」活動相關史料的整理上實為功不可沒。

正如本文開頭所言，本書雖出自法律史專家之手，然其不僅提出

¹³ 十九世紀末以後「嘈嚷樂音」即便存在，也常遭有心人利用，反加速其消弭。如在薩塞克斯(Sussex)，「嘈嚷樂音」在波爾戰爭(Boer War)期間被「親波爾派」(pro-Boers)用以表達其反政府意念。而在巴伐利亞(Bavaria)，「嘈嚷樂音」則成為黑社會恐嚇之法，或助長反猶太人的聲勢，最後更與納粹結合。參見 E. P. Thompson, "Rough Music Reconsidered," 20.

法律史研究的新取徑——人民的法律信念與法律體系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對政治社會的實際影響，也對十八到二十世紀英國社會史、以及英國文化史的研究貢獻匪淺。

(本文於 2014 年 12 月 21 日收稿；2015 年 6 月 1 日通過刊登)